

学者讲堂

破解儿童成长与养育的现代性迷思

——《童年人类学》的启示与价值

王曦影

《童年人类学》是一部鸿篇巨制，中文版600多页，捧在手中像一块厚厚的砖头。虽然不认识这本书的作者 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的戴维·兰西(David Lancy)教授，但我一直觉得，他是一名可爱而又执拗的研究者。这一大部头的问世，起因是他的一时之勇。

2002年，美国人类学顶刊《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类学家为何不喜欢儿童》的文章。该文指出，人类学家虽然在人类学领域的各个角落做研究，但却一直忽视或者错误对待童年。作为一名孜孜不倦研究儿童数十年的人类学家，兰西觉得被这一论点深深冒犯了，他随即写了一篇详尽的反驳文章，不料《美国人类学家》却以评论文章超出字数限制为由拒绝发表。兰西愈挫愈勇 既然文章不能发，不如将其扩充成一本书。写着写着，就成就了这部宏伟巨作。

《童年人类学》这部著作虽然厚重，但是可读性非常强，可谓一本童年研究的百科全书。这部著作是童年研究系统综述的集大成者，收集、分类且剖析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下儿童生活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不仅涉及生育、养育、教育、游戏、工作等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运用生命周期的视角关注了胎儿、婴儿、幼儿、少儿直至青少年发展的全部历程。兰西写作该书旨在促进儿童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了解，问世之后，这一著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者的预期，为广大的儿童人类学、教育学者、社会学者、普通父母，甚至每一个关心儿童的人，提供了一扇了解儿童的精致窗口。这部著作的英文第一版出版于2008年 第二版问世于2013年。2015年，《童年人类学》荣获美国图书馆学会 杰出学术著作奖。2023年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简体中文版历经7年的出版打磨，终于在国内众多学者的期盼下面世了。

怪异社会与村庄社会对峙下的儿童养育

《童年人类学》反复引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亨里奇(Joe Henrich)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 怪异社会(Weird Society)。怪异 这个词由如下五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拼凑而成：西方的(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社会的(Industrialized)、富裕的(Rich)、民主制度下的(Democracies)，将五个首字母W、E、I、R、D放到一起就是Weird 怪异。通常，西方社会常常与发达的、先进的、民主的、现代的等溢美的形容词紧密相联，兰西通过这一词语的运用，制造一种阅读上的反差，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视角，揭示了对人们习以为常甚至奉为宝典的、精密育儿儿的儿童养育实践的迷思。

与怪异社会相对立的存在是村庄社会，或者用兰西的话来说，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两种社会在文化上有着极大的区别，前者是 珍视幼儿/儿童，后者则是 尊崇长者。在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下，怪异社会形成以儿童为中心的精密养育(intensive parenting)方式，村庄社会则崇尚长者的权威，采取全村育娃的放养模式。

精密养育方式要求父母把子女养育放在家庭发展的首要位置，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父母需要全面安排、管理和规划子女的人际交往、学业发展、游



视觉中国 供图

戏时间和课外活动 需要陪伴他们、倾听他们、纠正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准备，确保他们走上 经济成功的美满人生。然而，这一备受推崇的育儿模式的核心特征是父母 尤其是母亲 围绕着子女团团转。兰西认为，这样的养育方式把家庭变成了一个类学校的机构，父母成为孩子们 耐心的教师，祖父母的育儿智慧被弃如敝屣，父母迷信育儿专家，一律照书养娃。这一育儿方式非常艰巨，也是过度组织化和商业化的 养育的核心目标变成了对子女的全方位投资，以帮助他们取得竞争优势并获取成功。目标明确而又单一的养育方式制造了家庭的紧张氛围，强化了父母的焦虑，对父母提出了无限的时间和精力要求。尤其对于母亲而言，完美母亲的话语将母职神圣化，将母爱与子女的安全依恋紧密捆绑在一起，母亲将这一观念内化，对自己进行持续不断的规训和行为审查。

村庄社会的儿童养育不仅松散而且松弛，父母在育儿中的核心功能大幅消解，母亲的角色被大大削弱，父亲的角色有时完全消失，全村育娃成为一种常见的儿童养育方式。希拉里·克林顿的《举全村之力》这本书似乎制造了孩子集家人和邻居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错觉，但村庄社会中的全村育娃更多的是一种务实主义的安排，谁有空谁就去照顾孩子。育儿活动的场域从核心家庭扩展到整个村庄，哥哥姐姐、祖父母、年纪大的孩子、亲属、村庄中的其他成员都有可能成为代理父母。儿童被教导尊重权威，被期望快速成长，学步儿的核心地位很快被婴儿替代。村庄里平坦的开放区域成为儿童成长的 母地(mother ground)，成人们远远注视，极少干预，极少教导，孩子们在此嬉戏成长，哥哥姐姐们在玩耍的同时漫不经心地照看着婴儿和学步儿，文化传承在自然而然中形成。

兰西通过详尽描写村庄社会各种松散的儿童养育实践，指出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做法都是儿童养育的现代性迷思。当父母成为孩子的仅有照顾者，各种科学育儿书籍又要求父母提供互动的、亲密的、一丝不苟的、全方位的教养，难怪越来越多的现代人选择不生或者少生。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村庄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代理父母，但又人人不负责任的话，对于儿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最佳的安排。儿童养育的重担不能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膀上，父亲、养父母、祖父母都一样有能力做好儿童养育的工作。21世纪的孩子怎么能过得更好呢？兰西的答案是，只要有一个相当称职且体贴的人全面负责，家庭周围具有爱心、智识以及奉献精神的帮手越多，孩

子们就会过得越好。

两种文化下的多元童年

兰西的英文原著书名除了《童年人类学》作为主题之外，还有三个特别生僻的英文单词作为副题，意思分别是小天使、附属品、调换儿(cherubs, chattel, changelings)，指出了在怪异社会和村庄社会中不同的童年形象。在怪异社会，孩子们珍贵如 小天使，在村庄社会里，孩子只是 附属品 调换儿。虽然表面看来，附属品 调换儿 远远不如 小天使 的地位那么诱人，但是兰西通过对村落童年的民族志的全面分析，质疑和挑战了当代心理学和教育学中关于儿童发展的很多观念。

在精密养育下成长的小天使 们既甜蜜温暖又苦不堪言。他们从小就知道，父母对他们寄予 出类拔萃 的厚望，替他们规划了一条笔直的阳光大道。他们一出生就被视为一个 空容器，父母和老师热衷于教导他们 恰当的思考、行动和感受，把他们变成充满内驱力和自制力、顺从守纪律而又追求卓越的学生。他们经济上无用，情感上却无价。他们的生活可能很富足，但精神却不快乐。即便参与游戏，他们的父母也要付费让他们学习，还得习得一系列被设计完善的游戏规则。他们 拥有权力，却没有自由，也不承担责任。随着教育的拉长和结婚的推迟，他们的童年越来越长，越来越被学业霸占，他们很少参与杂务课程，缺乏生活技能，即便成年，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父母的温柔巢穴。即便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也很少给父母提供经济回报。珍视幼儿、将儿童视为 小天使 的文化，剥夺了儿童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削弱了他们在观察模仿中探究学习的能力。父母刻意将儿童排除在成人文化的许多方面，他们受到了过度的保护和溺爱，他们成为书呆子，他们受到各种慢性病和心理疾病的困扰，他们变成了巨婴。

村庄社会里的儿童形象与怪异社会的小天使 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们在观察和模仿中学习，于无声处完成文化传承。他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习得社会行为准则、了解等级秩序，体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儿童的世界通常没有成人的参与，而成人的生活一览无余地在儿童眼前展开。他们擅长捕鱼、划桨、刺绣等各种杂务技能，知道自己要为家庭作出贡献，并早早运用自己掌握的生活技能获取食物和照顾弟弟妹妹。他们的童年很短，他们常常需要在工作 and 娱乐、工作和上学

之间作出权衡。他们在自然环境中如鱼得水，可到学校却呈现出严重不适和无能为力。

兰西浓墨重彩地对村落儿童进行勾勒并不是要制造一个遥远儿童世界的浪漫想象，而是力图描绘怪异社会中被过分保护和溺爱的儿童形象与村庄社会中儿童在丛林中自食其力形象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兰西在书中提及的一个例子，拉丁移民家庭的孩子每晚花几个小时给芭比娃娃太阳镜贴上价格标签，怪异社会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则会在玩具反斗城对这些太阳镜挑挑拣拣。兰西也详尽列举了村落儿童可能面临的各种困境：营养不良、街头流浪、艾滋感染、养家糊口、遭受绑架和暴力等等。当怪异社会的父母习惯于与孩子讲道理的时候，村庄社会的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互动常常是接受指令、训斥和体罚。最令人诧异的反差莫过于，怪异社会的孩子富足而不快乐，村庄社会的孩子尽管遭遇众多不幸，但他们的抗逆力很强，明显更加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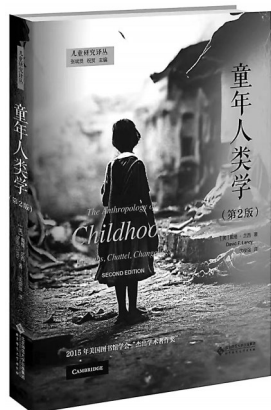
本书对我们的启示

虽然兰西在写作本书时一直将美国当作怪异社会的代表和批判的稻草人，但该著作对于理解快速变迁的中国都市社会下的亲子关系、儿童成长与教育有很多启发。

作为普通父母的读者们，至少可以从该书中得到如下几条宝贵意见：第一，精密育儿不应该是养育子女的金科玉律，母亲不应该是唯一的照顾者，父亲也应该积极参与共同养育。更重要的是，父母需要寻求所有能够寻找到的外援养育好孩子，又不放弃自己在养育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第二，过度保护和溺爱对孩子的成长不利，父母要学会放手，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让孩子拥有选择的自由，并学会承担责任，掌握充分的生活技能。第三，儿童有玩耍的权利，我们的儿童学业压力太大，要给孩子更多的空闲时间，让孩子在自然情境中游戏，让孩子在模仿和假游戏中学习。

《童年人类学》一书对推进中国童年研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长久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将儿童视为研究的客体，很少去观察儿童的生活、倾听儿童的声音、了解儿童的想法，更不要说透过儿童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研究者需要审视西方主流文化的精英育儿模式，探索符合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儿童观。儿童应该是童年文化的自主创作者。研究者可以对儿童一起开展研究，而不是居高临下对儿童进行研究，这是《童年人类学》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童年人类学》
[美]戴维·兰西 著
沈俊强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是故事的升华和自然结论。说故事和讲道理，应该水乳交融、互相成全，决不能成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故事要体现生活化、体验感、情境性，道理要展示时代感、思想性、教育性。

表达方式是 叙述+议论。事理文要做到有叙有议，叙夹议议，叙议结合。行文特点是 散文(随笔)体+杂感体等。注重文学性、可读性、即时性等，点面结合、虚实结合。

10年前 我曾到山东省杜郎口中学和昌乐二中实地观摩学习。时值春天，我坐在大巴上，放眼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长势喜人的麦苗和专心劳作的农民让我想起生长与生命的意义和庄稼人的智慧。由此，我从麦田想到学校，从农业想到教育，从农民想到教师。农民种庄稼，和教师教学生似乎有些共同点。从农民的角度看，麦子从幼苗到收割前，中间的过程都属于 未成熟状态。有经验的农民，不违农时，不拔苗助长，辅佐、协助妻子完成从种子、幼苗到成熟、收获的全过程。而拔节、吐穗、灌浆、结实，却是妻子自己要完成的事情，农民不能代替它。农民能做的，只是按时节，顺节气，播种、锄草、施肥、浇水，明了墒情与长势，预防旱涝与防治病虫害。

作为教师，如何对待学生的成长呢？怎样才算是真正为了学生呢？我觉得，首

先是尊重而不是歧视，是帮助而不是管教，是引导而不是代替，是启发而不是灌输。我们的教育，不是让学生学会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而是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主体性充分发挥，只是适时、适当、适度加以引导与点拨，让学生在体验、实践与活动中习得知识、能力与智慧。

这是我在考察学习结束后写的一篇教育随笔《教育即生长》中的主要观点。这篇随笔，有事有理，因事及理，事理融合，可以算是一篇 事理文。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阅读推广人、业余作家，我在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一直坚持散文、随笔的写作，其中有不少文章属于教育随笔。我先后写过《今天我们怎样做教师》《如何巧妙自我营销，看看古人怎样做》《书香校园从阅读开始》《万物静观皆自得》《何妨笨一点》《唯有母爱最动人》《讲好阅读和写作的故事》《坐着云起时》《学校美育，重在 浸润》《珍惜每一缕温暖温暖的阳光》《跟着老师们学语文》等等。教育随笔，让我能够用自己擅长的写作方式表达我对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健康成长等的观察、思考和感悟，助力我的教育实践和课堂教学，使它们更加科学，更有温度，更有效。

(作者系深圳市桂园中学副校长、中国教育报2022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通讯员 尉婷 孔子俊
本报记者 尹晓军

2000多年前，张骞从长安出使西域，一路穿过河西走廊抵达敦煌之山。他将敦煌 记为 敦煌，连带这里的风土人情、山川形势送回中原。汉武帝得此先机，下令征讨匈奴，占领河西地区， 列四郡，据两关。从此，敦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神秘的明珠。

2023年8月，历时16年，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主编的《敦煌通史》(七卷本)终于面世。这部丛书全面、完整、系统地重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

敦，大也。煌，盛也。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 华戎所交一都会？中原与西域文化如何在这里碰撞交流？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探索《敦煌通史》背后的故事。

敦煌史研究并不完整

敦煌区域的历史研究多依赖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百余年来，学界对吐蕃、晚唐张氏归义军、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历史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文献缺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前期、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历史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

2007年，郑炳林在北京参加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评审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林甘泉先生向他提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能否组织完成一部《敦煌通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

虽然当时学界有部分叙述敦煌历史的小册子，但都不足以呈现敦煌完整的2000多年历史。为什么不是一部完整的书呢？郑炳林萌生了完成《敦煌通史》的想法，也由此开启了长达16年的著书之旅。

2007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启动《敦煌通史》编纂。根据研究现状，郑炳林及其团队将敦煌历史划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占领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西夏元明清七个阶段，分七卷撰写。敦煌出土简牍数量众多，小到风土特产，大到移民制度、对外贸易，汉简中的信息极大程度上填补了两汉敦煌历史的空白。以往的研究多从后世记载的资料入手，内容多比较宏大，这次写作借助汉简，让我们了解更多当时真实发生的小事，很有意义。郑炳林说。

跌宕起伏的两千年

自西汉开始，敦煌的玉门关、阳关就被视为中原与西域的交界。正如郑炳林在总序中所言，敦煌在中原王朝的边防地位，影响着中原王朝对敦煌的态度及政策取向，而这又反过来对敦煌历史走向产生直接影响。

汉、隋、唐俱属大一统王朝，也是敦煌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上升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敦煌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团队成员陈光文副教授解释说，唐朝统治敦煌的160多年间，敦煌凭借其交通枢纽位置，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大都会，户口滋盛、文化繁荣，是其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

尽管敦煌曾聚集五湖四海的人们，但其文化的核心依然是华夏文明。团队成员杜海副教授说：根据文献记载，敦煌崇尚佛教，但归义军时期佛教仪式上的模式化套话也体现出儒家的忠孝、仁义、民本等思想。他认为，敦煌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研究完整的敦煌历史有利于探索华夏文明对民族交流交融产生的深刻影响。

到了西夏、元明清时期，陈光文说：敦煌军事、政治、交通地位虽有起伏，但总体呈日益下降趋势。清朝建立后，中央政府积极开拓西域，开始在关西地区逐步设立行政建制，同时向敦煌进行大规模移民。敦煌的重要地位再度凸显，成为经营西域的 口外之地，逐渐恢复生机。但由于其属移民区域且僻居内陆，最终成为西北地区的一座普通县城。

敦煌学研究不能只看敦煌

西汉时期，敦煌专门修建了西域都护的军备物资存储仓库 居卢仓，西域诸城邦的贡品皆经由敦煌进入中原，中原派遣至西域的官吏驻军也经由敦煌送往，因而成就了敦煌 华戎所交一都会 的名号。

敦煌的发展牵动着整个西北历史的发展，研究敦煌历史不能仅局限于敦煌本身。郑炳林说，学界曾有小敦煌，大敦煌 的说法，敦煌学的研究若拘泥于敦煌文献，那便只能做小 敦煌。敦煌学的研究若将敦煌置于中国西北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之中，敦煌的史学研究价值便能以小见大。

在郑炳林看来，当前敦煌学研究提倡的 东进西出 直接体现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东进 是将敦煌历史与中原历史联系起来，西出 是以敦煌为窗，观世界之像，研究历史上中央政府如何利用敦煌对外交往，可为我国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思路。

《敦煌通史》是敦煌学界第一部关于敦煌两千年的通史，七卷本由郑炳林及其学生历经十余年完成，背后离不开研究所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和坚持。团队项目更有利于重大研究成果的产出，这对个人、团队和学校都是共赢的。郑炳林说。当初与郑炳林一同撰写《敦煌通史》的学生，如今多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杜海在读读博士学位期间加入《敦煌通史》撰写团队，撰写《敦煌通史》对我而言是蜕变，不论是学术视野的开阔，还是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升，敦煌学已成为我们一生坚守的事业。

从早年重文献研究到如今补史、证史，敦煌学还在等待更多学者投身其中，古老的敦煌文化将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召唤中焕发新的生机。正如郑炳林所言：这个过程也许会很长一些，但一定会完成。

完整重现两千年华戎交汇之都

《敦煌通史》背后的故事

书海观潮

悦读互动

以“事理文”写教育随笔

陈冬平

读了李政涛教授的《教师为什么需要教育随笔》(2024年3月6日《中国教育报》第九版)一文，我颇有感触，觉得李教授说出了不少一线教师的心里话。一线教师的科研与课题研究，多是对教育教学中体验、感悟的 实证 研究。在此意义上讲，教育随笔特别适合那些具有钻研精神、具备一定科研能力和写作功底的一线教师。

李教授对 教育随笔 作了很好的解读和概括。所谓 教育随笔，我个人觉得，它是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常见的一种文体或表达方式，它跟我们一线教师很近、很亲。首先，它是属于 教育的。从内容上说，但凡跟教育教学有关 跟学校、课堂有关 跟教师、学生有关 跟家长、家庭教育等等有关的话题，都可以是教育随笔写作或表现的对象。其次，它属于散文之分支 随笔 这是属于形式的范畴。随笔既然是文学体裁 散文的一个分支，应

当具有散文的基本要求，具有形散神不散的特点，具有故事性、文学性、启迪性等特征。在写作上，可以不拘一格。

在长期的语文教育、写作教学和文学创作实践中，我总结归纳出了 事理文 的写作范式，用于教育随笔的写作。

所谓 事理文，是一种兼顾 记叙文和 议论文 二者优长的变体写作样式，是将语文层面的记叙文、议论文等文体与文学层面的散文(随笔)等体裁进行 跨界 融合后的写作范式。事理文的写作要点是，既要讲好故事，更要讲好道理。而这正是教育随笔写作的关键。事理文的写作，以叙事为要，以说理为重。因事及理，事理融合。叙事中的 事，既可以是故事，也可以是事件、事实，主要表达方式是叙。说理中的 理，可以是真理、道理，也可以是一种认识上的提升，主要表达方式是议。以事理文 写作教育随笔 要点如下：

基本构架是 说故事+讲道理。故事是基础，道理是归宿。故事为道理服务，当然也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道理